

**中国收入差距和贫困研究：
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应该知道什么？**

蔡 昉

工作论文系列四十二
Working Paper Series No.42

2005年1月

中国收入差距和贫困研究： 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应该知道什么？

蔡昉

一、收入差距和贫困研究的总体回顾

在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家庭之间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却依然存在，并且在许多方面还在继续扩大。因此，在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中，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在经济转轨时期，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困发生又是一个典型的现象。中国作为一个同时处于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国家和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自然会引起发展经济学家和转轨经济学家的关注。

事实上，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和贫困问题不仅引起了大量学者的研究兴趣，国内外学者发表了大量有关论文和著作，从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学科以及交叉学科的角度，对中国收入差距和城乡贫困问题进行了探讨，成果极为丰富。研究采用了各种目前国际上通行的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例如，学者们广泛讨论了有关收入差距和贫困衡量中的定义、标准和技术等问题，收入差距指标的分解技术，地区差距研究中的计量方法，如采用增长账户方法和增长回归方法等讨论增长中的趋同现象，国际比较的方法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及人类学、社会学特有的分析方法等等。

许多国内外研究机构更是把该领域的研究作为自己整个机构的一个选题重点，并因而处于该领域研究的前沿。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扶贫办的相关政策研究部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有关研究部门，等等。同时，这个研究课题也吸引了许多国际组织的注意，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等都高度关注中国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并直接或资助进行了大量研究。世界银行的国家贫困评估报告，反映了该组织对中国扶贫战略的肯定和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对于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成果。此外，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 UNDP 的组织下，从 1997 年每年出版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都给予收入分配和贫困状况特别的关注，2005 年该报告专门以收入分配为主题。

与收入差距和贫困相关的研究包括若干个方面，因而研究者们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框架。主要的研究领域有：收入分配问题，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以三类地区划分或以省、县划分的地区差距问题等。研究方法上也经历了从定性为主的价值讨论，逐渐深入到以大规模调查和使用国家统计局有关调查的大样本数据为依据进行的定量研究。比较著名的研究项目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收入分配课题组，迄今已经进行了三期抽样调查，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世界银行也进行了一系列包括大规模数据分析内容的贫困研究项目。联合国大学国际发展经济学研究院和美国国家研究局都出版了与中国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相关的大量著作和工作论文。关于中国收入差距和贫困的研究，不是仅仅从学术角度出发，而是以积极影响政策制订为取向。许多机构和个人的研究也确实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政策效果。

关于中国收入差距和贫困的研究成果，已经公开出版或发表的，就可谓汗牛充栋，涉及相关问题的各个方面。我们只能选取几个主要的方面，以十分概括的方式进行综述。并主要回答两个问题，即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以及我们还有哪些东西不知道并且需要知道。

二、收入差距和贫困的度量、描述和解释

中国的贫困问题既包括相对贫困，也包括绝对贫困。我们可以把相对贫困看作是收入差距的问题，通常指个人或家庭之间收入和消费的差距和地区差距，后者又包括城乡之间以及不同分类方式划分的地区（如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划分，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划分，城市划分或者县的划分等）之间差距。绝对贫困问题早期主要指农村贫困，主要在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城市贫困问题也开始引起广泛的重视。从贫困的特点看，也可以从三个阶段来观察绝对贫困问题：第一个阶段是指改革以前，表现为全面的农村绝对贫困。第二个阶段是农村改革取得初步成效以后，农村绝对贫困人口逐渐趋于边缘化，向边缘化的地区和人群集中。第三个阶段是冲击型贫困的出现，主要表现为因大规模城市职工的下岗、失业和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而造成的城市贫困。下面，我们以上述划分为线索，概述对中国收入差距和贫困的度量 and 描述¹。

2. 1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大幅度提高(Quah, 2002)。根据大多数研究者的观察，无论使用那种度量指标，中国城市和农村个人或家庭之间的收入和消费差距，都反映出典型的不平等趋势。特别是时间和更好的数据越来越表明，一度认为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按照国际标准来看并不大的判断是错误的（Gibson, Huang and Rozelle, 2000）。例如，世界银行专家（Martin and Chen, 2004）计算的全国基尼系数，从 1981 年的 0.31 提高到 2001 年的 0.447。根据另一项计算（Khan and Riskin, 2004），2002 年的全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达到 0.46。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围的比较中也处于很高的水平（UNDP, ）。分城乡的情况观察，农村的基尼系数从 1978 年的 0.21 提高到 1997 年的 0.34 和 2002 年的 0.38，而城市这几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 0.16、0.29 和 0.34，提高幅度比农村大 32 个百分点。一旦把城乡居民合并起来观察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在每一时期都分别高于农村和城市，1978 年为 0.30，1988 年就达到 0.38，2002 年高达 0.45，说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

学者们探讨了各种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较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传统的分解方法，主要从各种因素对不平等的贡献，以及不同人群的分解来讨论。例如，一项基于 1988 年和 1995 年的大型问卷调查的研究结果（Khan, Griffin and Riskin, 1999）发现，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的不平等程度都大大提高，其中工资收入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从 33.9% 提高到 45.6%。由于个人收入的增长落后于 GDP 的增长，城市贫困未能随着经济增长而减少。

一项基于回归分解的研究（Wan and Zhou, 2004）发现，在构成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中，地理位置的作用已经逐渐降低，而资本投入的作用日益显著，农业产业结构对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大于劳动和其他投入要素。黄祖辉等（2005）把农户收入差距分解为村庄内部和村庄之间两部分，发现内部差距主要是居民要素禀赋的贡献，村庄之间差距则来自于市场环境和村庄整体禀赋因素。

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人们不仅发现，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存在着就业机会和工资的性别歧视现象，人们还观察到并讨论了中国处在特殊转轨时期的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现象。例如，学者们尝试考察市场发育程度与性别歧视之间的变化关系。有研究发现，国有部门的性别工资差距，比非国有部门低得多（Maurer-Fazio and Hughes, 1999）。另有研究（Liu, Meng and Zhang, 2000）表明，从国有、集体到私有部门，工资差距中歧视能够解释的份额逐次降低。孟昕（Meng, 1998）按照找到工作的途径，把劳动力划分为两组，发现非市场组的性别工资差距，完全是由歧视造成的；而歧视却只解释市场组性别差距的三分之二。也有的研究（Mason, Rozelle and Zhang, 2000）发现，工资歧视程度和市场发育程度没有系统的联系。

另一种劳动力市场歧视是中国特有的对城市中本地户籍的外来工的歧视。借助于一些成型的分解技术，人们考察了在城市中本地户籍劳动者与外地户籍劳动者的工资差异中，有多大的组成部分是歧视所造成的。并进一步把歧视区分为进入岗位的歧视和在同一岗位上的歧视。如孟昕等的研究（Meng and Zhang, 2001）发现，外来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工资差异的 82%，是由职业内的工资差异带来的，职业间的工资差异对两者工资差异的影响很小，只有 18%。蔡昉、都阳、王美艳（2005）的分解结果则显示，岗位进入产生的工

¹ 实际上，部门之间的不平等也是值得高度注意的。虽然迄今为止地区差距表现出比部门差距更严重，但一些垄断部门在改革和开放过程中制造和获得经济租金从而获得非生产利益，已经为一些学者观察到（Galbraith et al., 2004），而且，至少从制造业的工资差距看，已经出现了部门差距大于地区差距的趋势（Cai and Du, 2004）。

资差别占全部歧视因素的 63%，大大高过岗位内的工资歧视（38%）。这与观察到的户籍制度导致的农民工就业岗位的集中状况更加符合。

2.2 地区收入差距和发展差距

虽然关于地区差距的日益强烈的呼声主要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中国的地区差距却并不是改革以来才发生的现象。崔开源（Tsui, 1993）使用较长时期的分地区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等历史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早在改革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即存在比较严重的地区差距。另一项研究（Kanbur and Zhang, 2004）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有三个地区差距高峰，分别为 20 世纪 50 年代末“大跃进”之后、“文化大革命”期间和 90 年代后期的对外开放的扩大期间。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经济改革，在一段时期大幅度缩小了地区差距，随后又再次上升。例如，按照分省人均 GDP 计算的各种不平等指标，如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 σ 指数（变异系数的对数）等，都显示出在 1978-1990 年期间的下降以及 1990 年以后提高这样一个 V 字型变化轨迹（如 Jian, Sachs and Warner, 1996; Cai, Wang and Du, 2001）。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这种地区差距无非就是作为原因的增长速度的差异或“ β 趋异”，以及因其所导致的人均收入绝对水平的差异或“ σ 趋异”（Sala-i-Martin, 1996）。所以，学者们借助增长理论和经验方法的新进展，从经验上通过探讨中国区域间增长为什么趋异，以及在何种场合产生条件趋同，解释地区差距。

关于经济增长，有两类经验研究，即增长账户和增长回归。增长账户把产出增长归于各种可度量的投入要素的变化，如物质资本、劳动、广义人力资本和残差（全要素生产率）。使用前沿生产函数方法分解全要素生产率，吴岩瑞（Wu, 1995）比较了沿海和内地以及国有工业、农村工业和农业三个部门的生产率和效率。他发现，沿海和内地的生产率和效率差距在国有工业和农业部门中比较大，而在农村工业部门中比较小，并且不断缩小。Fleisher and Chen（1997）进一步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的决定因素，发现高等教育投资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上面的差异有助于解释沿海和内地的生产率差距。由于内地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比沿海地区大约高 20%，而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内地较低，因此，应该加大对内地的教育投资。世界银行（World Bank, 1997）以及蔡昉和王德文（1999）进一步分解了全要素生产率，发现改革期间劳动力流动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具有显著贡献。

然而，正如 Topel（1999）所指出的，增长账户方法的不足在于它未能强调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劳动力市场扭曲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前计划经济国家不像在中国那样具有典型性。因此，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的不同可能有助于解释中国不同省区之间的经济增长差异。事实上，主要由 Barro（1998）和 Sala-i-Martin（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5）倡导的增长回归的方法，允许把诸多理论上可能影响地区间增长差异的因素，特别是制度性因素放入一个方程，以观察条件趋同过程中的各种变量效果。因此，大量研究采用了这种方法，检验了一系列影响地区差距的因素。在这类研究中，学者们通过选择不同的变量，考察了特定的问题，检验了相关的假说。例如，在普遍发现初始期人均收入水平与随后的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条件趋同），以及人力资本禀赋正面地促进经济增长外，被证明对于地区差距具有显著影响的还有诸多因素，并且对于中国具有明显的针对性。这些因素包括如劳动力市场扭曲（Cai, Wang and Du, 2002），经济的外向型程度（林毅夫和李永军, 2003; Wei and Wu, 2001），地理位置和优惠政策（Demurger et al., 2002）等等。此外，万广华等（Wan, Lu and Chen, 2004）利用夏普里值（Shapley Value）分解法，分析了地区间收入差距因素，发现全球化因素持续且日益增长地扩大着地区差距¹。

研究者对各种造成不平等因素进行分解，尝试从构成收入差距指标的不同成分中寻找造成不平等和贫困的重要因素。例如，有的研究分解了反映地区差距的泰尔指数，发现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对中国改革以来出现的地区差距扩大，做出了主要的贡献（林毅夫等, 1998）。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框架来看，这种现象反映了一种俱乐部趋同（蔡昉、都阳, 2000）。古斯塔夫森和李实等人（Gustafsson and Li, 2001; 李实和岳希明, 2004）的经验研究，也支持了这种判断。虽然 Kanbur 和 Zhang（2004）分解 GE 的意图在

¹ 如果使用较少加总的城市一级的数据，地区差距会更大，开放和相关政策对差距扩大的贡献也更显著（Jones et al., 2003）。

于说明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差距在总体地区差距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们的分解实际上也显示出，城乡收入差距始终保持着总体地区差距的主要贡献者地位。

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有关地区差距问题的认识都很有助益。首先是它们的政策意义。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旨在缩小地区差距的重大政策和行动计划，包括实施西部开发战略和东北振兴战略。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如何使政策资源和物质、财政资源更有效地发挥缩小差距的作用，各种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学术成果，都会或多或少地对于这一目的产生影响。此外，这些研究也具有推进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理论的学术价值。Srinivasan 和 Bhagwati (1999) 曾经指出，由于不能控制各国的体制和政策差异，跨国回归存在着方法论上的弱点。因此，他们十分倡导用国家个案的方式进行增长研究（还请参见 Wei and Wu, 2001）。中国的个案研究，由于其能够更好地掌握和反映政策和体制因素，数据具有更好的可比性，恰好提供了改进这种传统方法的实验机会。

2.3 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

城乡收入差距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逐年扩大。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个收入指标的比较来看，如果不考虑城乡物价指数变化因素的话，城乡收入比率（以农村收入为 1）从 1978 年的 2.6 一度下降到 1983 年的 1.8，随后持续提高，达到 2003 年的 3.2。如果考虑到城乡零售物价指数变化的不同，城乡收入比率从 1978 年的 2.6 下降到 1988 年的 1.5，随后提高并且达到 2003 年的 2.4。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这里使用的城乡收入概念并不完全可比，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的其他福利折合成收入，城乡收入差距还会大幅度扩大（参见李实等，2004）¹。这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仅是长期存在并且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还是城市和农村贫困继续存在并且扩大的原因。例如，姚树洁等（Yao et al., 2004）的研究表明，用基尼系数表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每提高 10%，分别导致城市贫困发生率提高 15%-30%，农村贫困发生率提高 21%。学者们还讨论了城乡收入差距在改革之后扩大的原因，如 Tian (2001) 把原因归结为中央政府财政能力减弱、金融体制的系统性城市偏向和小规模农业的结构脆弱性。

城乡收入差距是地区差距中的一个最重要方面，也是许多研究者特殊关注的重点。正如在发展经济学中一样，研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通常也是从诉诸城市偏向理论出发。形成城市偏向政策的手段通常是实行所谓的“剪刀差”政策，即通过政府扭曲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创造一种不利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政策环境，获取农业剩余以补贴工业化（Schultz, 1978; Anderson et al., 1986）。而形成这种政策倾向的解释，则主要有两种范式。

第一种理论范式是从国家实行工业化战略的目标和途径出发解释的，即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坚信，工业部门是经济迅速增长的催化剂，而对农业征税可以为工业化提供绝对必要的财政支持（Krueger, 1991 和 1992）。

第二种理论范式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的政治结构造成城乡居民在政治谈判地位和政策影响力上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等（例如 Lipton, 1977; Bates, 1981）进一步，贝茨和奥尔森（Olson, 1965）把农民缺乏政治力量归咎于因居住分散而导致的集体行动中过高的沟通成本，以及由于单个农民的产品只是农业产出的微小份额，因而造成免费搭车现象。由此便形成农民人数众多而政治影响力微弱这种所谓“数量悖论”（Olson, 1985）。可见，发展经济学研究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具有悠久的历史政治经济学分析传统。

鉴于中国跨越了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牺牲三农利益，以及改革以来由于城乡利益在宏观政策制定中权重不同而导致的三农问题的严重化两个阶段，可以同时检验上述两种理论范式。林毅夫等（Lin, Cai and Li, 1996）揭示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农业经济的危害，Kanbur and Zhang (2004) 实际检验了该战略在改革前时期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中起的重要作用。杨涛等（Yang and Cai, 2003）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通过回顾改革前后的政策变化，以及改革的不同阶段特点，发现中国改革前后恰好经历了一个构成城市偏向政策两种政治经济学根源的转变。从同一逻辑出发，蔡昉（2003）认为，随着城乡收入的实际差距接近和达到改革初始的水平，农民将通过“退出”机制即

¹ 然而，一些研究也表明，如果使用城乡居民的生活费用对收入进行调整，收入差距则没有那么严重（Ravallion and Chen, 2004）。

“用脚投票”，促进制度变革的条件成熟，最终推动城市偏向政策的改变。21 世纪前几年中央政府三农政策以及相关政策的一系列变化，已经表明了这种政策倾向的转变（宋洪远等，2005）。

2.4 农村贫困：从普遍到边缘化

农村改革对于普遍的绝对贫困减贫效果十分显著，得到了各方面的肯定。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3）数据，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 1978 年的 2.5 亿减少到 1985 年的 1.25 亿，平均每年减少 1800 万，贫困发生率从 30.7% 下降到 14.8%。在那之后，减贫的速度开始下降，1985-1990 年期间，贫困人口进一步减少到 8500 万，每年平均减少 800 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9.4%。而自 1990 年之后，减贫速度进一步放慢，减贫效果逐渐显示出边际递减的趋势。在 1990-2003 年期间，贫困人口减少到 2900 万，每年平均只减少贫困人口 400 万，其中还有两个年份（1991 年和 2003 年）出现贫困人口绝对增加的现象。

虽然中国扶贫成就得到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如世界银行，2001），但是，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政府确定的农村贫困线过低，因此不是一个国际上广泛使用并且具有可比性的标准（CSLS，2003）。因此，也有许多不同的关于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的估计，通常远远高于中国公布的数字（如参见 Park and Wang, 2001）。

即使采用更能够广泛接受的贫困标准，也不能否定中国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减少贫困的效果。但是，扶贫成就在时间上和地区之间是不平衡的（Ravallion and Chen, 2004）。在农村贫困减少的情况下，收入不平等程度提高了，并且产生了新的贫困类型——冲击型的城市贫困。但是，即便如此，改革开放产生的巨大扶贫效果也是不容否定的。世界银行专家（Ravallion and Chen, 2004）利用最新的数据和度量方法，并且把农村贫困和城市贫困合并观察发现，在 1981-2001 年期间，中国整体贫困发生率从 53% 下降到 8%。

随着贫困人数的绝对减少，扶贫效果边际递减的现象显示了一个农村贫困人口从地理分布上和人群组合上的边缘化倾向，即他们越来越集中在生活和生产条件极为恶劣的边缘化的地区，并且集中在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较差，没有足够的生存能力的人群¹。但是，也有的学者持不同的看法。如 Khan（1998）和 Riskin（1994）否认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边缘化趋势，从地理分布上，他们发现在中国的心脏地带，贫困也普遍存在。

对于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按照地理和人群特征的分布的观察与判断不同，隐含的政策建议也是不同的。如果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真正边缘化了的话，现在以地域性开发式的扶贫战略就不再奏效，而需要转向更加注重瞄准个人和家庭的扶贫方式。如一种建议是用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方式，取代现行的开发式扶贫方式，以解决剩下的 2000-3000 万绝对贫困人口（如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部，2004；蔡昉和都阳，2004）。由于 2003 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出现反弹，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80 万，涉及应该用怎样的方式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再次引起争论，在可能预期对扶贫产生效果的三种途径中，即靠农村整体的发展，或依靠开发式的扶贫，或者转向救助式的扶贫，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最低生活保障的方式解决绝对贫困问题。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银行专家对贫困人口做出的暂时性贫困（transient poverty）或永久性贫困（chronic poverty）的划分（Jalan and Ravallion, 1998），就预见到了贫困必然出现反弹的情景，并且可以支持扶贫战略转变的政策建议。世界银行专家划分的三种贫困状况是：（1）当年陷入贫困且属于永久性贫困，（2）当年陷入贫困但不属于永久性贫困，（3）当年不处于贫困但属于永久性贫困。从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当年陷入贫困且属于永久性贫困的比重最高，意味着处在永久性贫困状态的人群，每年陷入贫困的概率最高。与此相类似的现象是，属于永久性贫困而当年没有陷入贫困状态的概率比较低。但是，这两类人群的比例是比较稳定的，而当年陷入贫困但不属于永久性贫困的人口

¹ 例如，据有关部门统计，在 2002 年仍然存在的 2820 万农村贫困人口中，有 560 万人为五保户（占 20%），979 万人为残疾人口（占 35%），800 万人（占 28%）居住在不适宜人类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最终需要搬迁移民的。剩下的未获温饱人口中，有相当大部分也是患有长期慢性疾病或体弱多病丧失或部分失去正常劳动能力的（转引自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部，2004）。

比例，却有着较大的变动性，就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可见，深入研究贫困的性质，的确是政策选择所必需的。

2.5 改革冲击与城市贫困

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城市贫困是由于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剧烈调整，改革深入到劳动和社会保障体制后出现的冲击所造成（Meng, 2004；李实和 Knight, 2002）。如孟昕（Meng, 2004）把中国城市的改革划分为两个时期，分别是稳健的阶段（1988-1995年）和激进的阶段（1995-1999年）。她发现在前一时期，收入不平等主要是一部分人群收入增长快于另一部分人群的结果，而后一时期则由于大规模失业造成一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有绝对的降低。这种转轨时期的冲击型贫困，产生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特征。例如，由于就业以及获得社会保障的不确定性提高，家庭现期收入不再能够代表持久性收入，一部分城市家庭即使是低收入家庭，也通过缩减消费而以备不时之需，从而处于一种家庭收入虽然高于贫困线，消费却低于贫困线的状态，从而陷入所谓“选择性贫困”（李实和 Knight, 2002）。

因此，为了帮助经济和社会转轨的完成，需要一种具有针对性并且有效的救助机制，为这种特殊的贫困群体构筑一个安全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否安全地保障那些真正需要的人群，需要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是贫困线的确定是否能够足以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第二是社会救助机制能否有效、准确地瞄准这个特殊需要群体。

确定城市贫困线有两个出发点，其一是用于贫困问题的诊断，以便从较广阔的视野观察和解决问题。另一个是具体用于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的发放（Hussain, 2003）。由于用于后一用途的贫困线受到诸多现实约束，所以与理论上的贫困线往往有巨大的脱节。利用在一项研究中学者估算的理论贫困线，与地方政府实际执行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比较（Hussain, 2003），我们可以发现：（1）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与理论贫困线具有较高的相关性，说明低保政策设计的方向与理论所预期的基本相符；（2）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普遍向低于理论贫困线的方向上偏离，说明该制度受到财政能力的制约；（3）大致显示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越高的城市，越倾向于接近理论贫困线；相反，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越低的城市，越多地向下偏离理论贫困线。这同样说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对理论贫困线的偏离，是资源制约的结果。

许多中国学者从整体的层次上识别了哪些城市群体易于陷入这种冲击型贫困状态，以便为政策瞄准提供依据。通常，人们归纳的面对冲击的脆弱群体包括退休者、失业和下岗职工，特别是他们中的“40-50”人员、女性劳动者，以及来自农村的迁移劳动力（蔡昉主编，2003）。利用中国5个大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Giles et al.（2003）对下岗、失业者，以及退休和早退人员的生活和保障状况进行了详尽的描述。王德文和张恺悌（2005）分析了老年贫困问题。此外，由于户籍制度排斥了外来劳动力作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权利，从而造成一种权利的贫困。根据Hussain（2003）的一项研究，在31个重点城市中，按照相同的贫困线，外来移民的贫困发生率比拥有当地户籍的人口平均要高出50%，在一些城市甚至要高出2-3倍。

三、还有哪些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中国在短期内经历了诸多制度变革和发展现象，有经验也有教训。中国遇到的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也是发展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的关注重点。有众多的理论假说有待于中国现实进行检验，经济学的成果也将有助于中国缩小地区差距和摆脱贫困的努力。为了实现这双向的目标，尚有很多课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下面择要提出几个选题。

3.1 劳动力流动减少贫困和地区间不平等了吗？

关于中国地区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通常会与限制劳动力流动结合起来。例如，奈特等（Knight et al., 1999）通过把刘易斯模型和一个剪刀差模型相结合，描述了一个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扭曲的城乡关系政策所造成的城乡差距格局。经济学所讲的迁移，意味着劳动力从边际劳动生产率近乎为零的农业转移到非农部门，可以通过

缩小两个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差别，而缩小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许多发展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种重要机制。针对中国的情形，许多研究者也做了类似的预期。

例如，Whalley 和 Zhang (2004) 通过一项模拟表明，一旦取消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对于劳动力迁移的障碍，现存的收入不平等则会全部消失。这里，他们的假设是户籍制度是劳动力迁移的惟一障碍，或者换句话说，存在户籍制度就意味着劳动力不能流动。Hu (2002) 通过构造一个地区积聚模型得出的结论是，沿海地区在贸易上的地域优势，加上劳动力迁移主要发生在该地区内部，是造成地区差距扩大的原因。但是，已经大规模发生的劳动力迁移不仅发生在地区内部，跨地区迁移也是一种显著的现象，事实上劳动力从中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动恰好是中国的一个特点 (Cai and Wang, 2003)。林毅夫等 (Lin et al., 2004) 通过估计迁移者对收入差距的反应弹性，认为迁移的确是一种缩小差距的的机制，但他们同时也观察到，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区过快的发展速度，目前的迁移规模仍然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蔡昉 (2005) 指出，可能产生缩小地区差距效果的迁移，必须满足若干基本条件。而户籍制度的继续存在使得这些条件不能满足，以致迁移不能发挥其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

但是，上述研究成果虽然增进了人们对迁移和差距之间关系的认识，但仍然是一些假说性的解释，尚未得到经验的验证。归根结底，迁移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理论预期，与现实中并没有发生的事实，形成一个悖论，对经典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要求研究者通过获得更好的数据，借鉴更先进的方法，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

3. 2 国际比较：发展中国家和转轨中国家

从贫穷发展为富裕、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轨道，是当代世界的两个重要国际性现象。这个发展和转轨的过程，初衷是消除不平等和贫困，但是，往往却又成为造成新的不平等和贫困现象的原因。因此，国际上针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中国家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的研究十分活跃，丰富而大量的文献，一方面尝试为在这两个过程中消除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政策处方，另一方面试图验证一些发展经济学或者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假说。例如，转轨经济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成为一个关于不平等是否推动经济增长的争论的良好实验机会。许多文献 (Persson and Tabellini, 1994; Alesina and Rodrik, 1994) 都从理论和经验上表明，由于收入不平等导致政府倾向于对投资和生产性活动征税，对私人产权缺乏保护，因而对于经济增长是有害的。但是，也有文献从理论和经验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如 Li 和 Zou (1998) 发现，如果公共消费可以进入效用函数，收入不平等在理论上可以促进增长，而且获得了经验上的支持。如果说这些争论从经验上依靠的更多是历史数据的话，转轨国家最新的经验可以为继续这方面的讨论提供更好的条件 (例如 Sukiassyan, 2003)。

中国与中东欧以及原苏联国家，都正在经历经济和社会的转轨，并且出现了由此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贫困发生率提高的趋势。对于这些转轨国家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研究，无疑把以往主要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内容推展到转轨经济学的领域。虽然许多转轨经济研究都涉及到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将其作为不同转轨方式的相同或不同的后果来进行讨论 (如 Galbraith et al., 2004; Ivaschenko, 2002)，同时，中国与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不同转轨方式，也构成了比较的动机和意义，但是，把中国与其他转轨中国家的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进行比较研究，以提高人们对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后果的认识，仍然是一个相对薄弱的学术领域。

中国和印度是两个发展中大国，同时也是都是贫困人口总量很大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在收入分配格局以及贫困的发生方面，有哪些共同之处，又有哪些各自的特点，回答这样的问题，无异于解答了发展中国家在收入不平等和贫困方面最主要的难题。Ravallion (2004) 观察到，中国与印度相比而言，贫困发生的程度要低，但是，不平等程度更严重。他同时还从人力资本禀赋、土地制度、政府作用等方面，总结了两国在减少贫困效果的一些不同之处，并从两国经验得出贫困和不平等不是高速经济增长的催化剂的结论。更新的研究 (Ravallion and Chen, 2004) 揭示了经济增长方式差异会产生不同的贫困和收入不平等后果。Quah (2002) 验证了两个国家在增长过程中都有不平等的大幅度提高，但增长的确帮助大量绝对贫困人口脱贫。此外，世界银行做了大量在比较中进行的中国贫困和不平

等研究。例如，上述结论就得到了另一个报告的支持（Vinod et al., 1997）。但是，更加充分的理论和经验探讨仍然有待于深化。

3.3 我们如何把研究成果应用于政策制定？

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学问，而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的研究，更应该是以自己的成果帮助政府制定正确的政策，帮助社会对问题有更加正确的认识为目的。大多数从事中国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的学者，无疑都是具有自己的政策针对性的。但是，学术成果最终应用到政策制定中，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需要很多特殊的努力。

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政策解释力如何本身就是研究成果价值的试金石。如果以决策价值作为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研究的出发点和标准的话，许多研究成果在政策含义的解释和深化上面，离政策要求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多数发表的论文和研究报告花大量篇幅回顾文献、解释模型和数据，以及讨论统计技术问题，但一旦统计和计量结果出来以后，对于政策含义以及执行方面的讨论，却往往一笔带过。按照同样的标准评价，许多论文过于受杂志发表导向，有些研究结论在政策建议的推论方面，存在着简单化，甚至忽略历史背景和国情的缺陷。举例来说（参见 Khan, 1998），许多关于收入分配和贫困的研究都涉及到人力资本回报率的问题，有时将其与政治资本回报率相比较。后者往往用“是否中共党员”做代理变量。一旦得出政治资本与报酬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的话，学者们当然不会去得出通过扩大党员人数而减少贫困的结论，但往往简单地把党员身份看作是一种特权，而忽略了其包含了教育水平不能充分涵盖的人力资本内容。

另一方面，用学术成果影响决策者，本身就是一门学问，需要有专门的技能和技巧。近年来，国际上许多从事贫困研究的著名机构都设置了专门的课题，研究如何与政策制定人进行交流，并且把学术结论变成决策行动。例如，ODI（2004）通过文献回顾，总结了31种理论模型，帮助研究者与决策者沟通，以使用研究成果来影响政府决策行为。

3.4 关于研究技术的应用问题

发展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科发展了许许多多研究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的新理念和新方法。若干年前，人们还认为贫困就是收入低下或者食物不足，而这种匮乏的原因是人们没有生产出足够的数量。在森（2002）的理论和一系列其他出版物（如 UNDP, 1994-）广泛传播的影响下，今天人们则普遍认识到贫困还有它的人文维度，而且权利的贫困既是更持久的贫困，也是物质贫困的根源。新的理论和理念孕育出新的研究方法，应用这些新方法，人们可以更准确地观察不平等和贫困的各个方面，有能够更深入地观察具体问题的一个或某个角度¹。

在关于中国收入差距和贫困的研究中，各种技术和方法广泛得到了应用。例如，对各种反映不平等的指标的分解技术，被用来帮助探寻造成不平等和贫困的原因或因素。在各种新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困难，值得解决和克服。例如，在一些研究中存在着重技术轻思想的倾向。Srinivasan 和 Bhagwati（1999）曾经批评进行跨国回归中的“右手边斗士”（RHS Warriors）²。在关于中国的一些研究中，同样存在着模型的使用缺少理论依据和现实针对性的现象，从而降低了这些成果的学术价值和政策意义。此外，对于更深入地进行研究而言，最大的困难往往莫过于获得适用的数据。一些公共数据的使用和开发仍然受到部门利益的束缚。例如，一项在许多国家已经广泛采用的研究贫困的新方法——贫困定位（poverty mapping），既有学术意义，即帮助研究者更确切地将研究对象定位，更具有政策含义，即提高政策的瞄准水平。但是，该方法在中国的应用却受到可用数据的制约³。另一方面，大量研究机构的调查数据也采取封锁的态度，因不能共享而造成资源的浪费。

¹ 例如 Yang 和 Lin（2000）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重新考察了 1959-1961 年的灾害，验证了森的食品权利假说。

² 指研究者们依靠在方程式的右手边添加变量，并用其回归结果支持自己的理论假设，与不同意见的学者论战。

³ 在一些关于贫困定位的文献中，中国的统计部门常常被作为不情愿提供数据的典型（如 Minot and Baulch, forthcoming）。这类说法虽然有所偏颇，但是，为进行贫困定位所需的必要数据，一般研究者的确很难获

参考文献

- Ahuja, Vinod, Benu Bidani, Francisco Ferreira, and Michael Walton (1997) *Everyone's Miracle? Revisiting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East Asia*,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 C.
- Alesina, Alberto and Dani Rodrik (1994) 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9, No. 2, pp. 465-490.
- Anderson, Kym and Yujiro Hayami (198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East Asia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Sidney· London· Boston: Allen & Unwi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Australia-Japan Research Centr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Barro, R. & X. Sala-i-Martin (1995).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McGraw Hill, Inc.
- Barro, R. (1998)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Stud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The MIT Press.
- Cai, Fang and Dewen Wang (2003)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 *The China Review* 3(2): 73-93.
- Cai, Fang and Yang Du (2004) Labour Market Integration: Evidence from Wage Convergence in Manufacturing in Garnaut and Song ed *China: Is Rapid Growth Sustainable*. Asia Pacific Press.
- Cai, Fang, Dewen Wang and Yang Du (2002) Regional Dispar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e Impact of Labor Market Distortions, *China Economic Review*,
- CSLS (2003), China's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and Its Impact on Poverty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Living Standard Research Report 2003-07*, Ottawa.
- Demurger, Sylvie, Jeffrey Sachs, Wing Thye Woo, Shuming Bao, Gene Chang and Andrew Mellinger (2002) Geography, Economic Polic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sian Economic Papers*, Vol. 1, No. 1, pp. 146-197.
- Dennis T. Yang and Fang Cai (200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Rural-Urban Divide, in Nick Hope, Dennis T. Yang and Mu Yang (eds) *How Far Across the River? Chinese Policy Reform at the Millenniu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89-416.
- Fleisher, B. & Chen, J. (1997), "The Coastal Non-Coastal Income Gap, Productivi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Policy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25, 220-236
- Galbraith, James K., Ludmila Krytynskaia and Qifei Wang (2004) The Experience of Rising Inequality in Russia and China during the Transi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1, No. 1, pp. 87-106.
- Gibson, J., Huang, J. and Rozelle, S. (2001) Why is Income Inequality so Low in China Compared to Other Countries? The Effect of Household Survey Method, *Economics Letters* 71: 329-333.
- Giles, John, Albert Park, and Fang Cai (2003) How has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ffected China's Urban Workers?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s Series* No. 2003-628.
- Gustafsson, Björn and Li Shi (2001) A More Unequal China? Aspects of Inequality in the Distribution of Equivalent Income, in Riskin, Carl, Renwei, Zhao och Shi, Li (Editors) *China's Retreat from Equality: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M.E. Sharpe.
- Hu, Dapeng (2002) Trade,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Regional Income Dispar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Spatial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Inspired by the Case of China,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32: pp. 311-338.
- Hussain, Arthar (2003) *Urban Poverty in China: Measurement, Patterns and Policies*,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 January.
- Ivaschenko, Oleksiy (2002) Growth and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Transitional Economies, *CESifo Working Paper* No. 747, Category 5: Fiscal Policy, Macroeconomics and Growth, CESifo, a joint initiative of University of Munich's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 and the Ifo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 Jalan, Jyotsna and Martin Ravallion (1998) Transient Poverty in Post-reform Rural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6, pp. 338-357.
- Jian, Tianlun, Jeffrey D. Sachs and Andrew M. Warner (1996) Trends in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7, Issue 1, Spring, Pages 1-21.

得。或许世界银行专家（Ravallion and Chen, 1999）的说法更加贴近：“经济改革比统计改革发生得更快”。

Jones, Derek, Cheng Li and Ann L. Owen (2003) Growth and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Era, *William Davidson Working Paper* No. 561, The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Business School.

Kanbur, Ravi and Xiaobo Zhang (2004) Fifty Years of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A Journey through Central Planning, Reform, and Openness,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IDER Discussion Paper* No. 2004/50.

Khan, Azizur Rahman (1998) Poverty in China in the Period of Globalization: New Evidence on Trend and Pattern, *Issues in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No. 22, Development Policies Department,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

Khan, Azizur Rahman, Keith Griffin, and Carl Riskin (1999) Income Distribution in Urba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Economic Reform and Global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 89, No. 2.

Knight, John and Lina Song (1999) *The Rural-Urban Divide, Economic Disparities and Interactions in China*,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 Hongyi and Heng-fu Zou (1998) Income Inequality is not Harmful for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2, No. 3, pp. 318-334.

Lin, Justin Yifu and Dennis Tao Yang (2000) Food Availability, Entitlements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61, *Economic Journal*, Vol. 110, Issue 460, pp. 136-158.

Lin, Justin Yifu, Fang Cai and Zhou Li (1996)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Lin, Justin, Gewei Wang and Yaohui Zhao (2004)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Labor Transfers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2 (3): 587-603.

Liu, Pak-Wai, Xin Meng and Junsen Zhang (2000) Sectoral Gender Wage Differentials and Discrimination in the Transitional Chinese Economy,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3:331-52.

Mason, Andrew, Scott Rozelle and Linxiu Zhang (2000) Gender Wage Gaps in Post-Reform Rural China, *CCAP'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WP-00-E25,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Maurer-Fazio, Margaret and James Hughes (1999) The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on the Relative Earnings of Chinese Women: Traditional Values vs. Market Forces,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Bates College, Maine.

Meng, Xin (1998), "Male-female Wage Determination and Gender Wage Discrimination in China's Rural Industrial Sector", *Labour Economics*, 5:67-89.

Meng, Xin (2004)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0 (3): 357-379.

Minot, Nicholas and Bob Baulch (2002) Poverty Mapping with Aggregate Census Data: What is the Loss in Precision? *MSSD Discussion Paper* No. 49. Markets and Structural Studies Division,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04) Communications literature review: Theoretical Modells, ODI website: <http://www.odi.org.uk/RAPID/Lessons/Theory/Index.html>, UK.

Park, A. and Wang, S. (2001) China's Poverty Statistics,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12, pp. 384-398.

Persson, Torsten and Guido Tabellini (1994) 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No. 3, pp. 600-621.

Quah, Danny (2002) One Third of the World's Growth and Inequality, *Discussion Paper* No. CEPDP0535, Center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Ravallion, Martin (2004) Less Poverty and More Inequality in China, India, A Summary of the Lecture at the Council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 Delhi, http://www.financialexpress.com/fe_full_story.php?content_id=76579

Ravallion, Martin and Shaohua Chen (1999) When Economic Reform Is Faster Than Statistical Reform: Measuring and Explain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1 (1): 33-56.

Ravallion, Martin and Shaohua Chen (2004) 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aper* 3408,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World Bank, Washington, D. C.

Sala-i-Martin, X. X. (1996), "The Classical Approach to Convergence Analysis", *The Economic Journal*, 106 (July), 1019-1036.

- Schultz, T. W. (ed.) (1978) *Distortions of Agricultural Incentiv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Srinivasan, T. N. and Jagdish Bhagwati (1999) Outward-Oriented and Development: Are Revisionists Right? *Economic Growth Center Discussion Papers*, No. 806, Yale University.
- Sukiassyan, Grigor (2003) Inequality and Growth: What Does the Transition Economy Data Say? <http://www-rcf.usc.edu/~gsukiass/>
- Tian, Qunjian (2001) China's New Urban-rural Divide and Pitfalls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Canadi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2 (1): 165-190.
- Topel, Robert (1999) Labor Markets and Economic Growth, University of Chicago. <http://gsbwww.uchicago.edu/labor/topel.pdf>.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various issues)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n, Guanghua and Zhangyue Zhou (2004)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United Nations *WIDER Research Paper* No. 2004/51.
- Wan, Guanghua, Ming Lu and Zhao Chen (2004)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within China,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IDER Discussion Papers* No. 2004/10.
- Wei, Shang-Jin and Yi Wu (2001) 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Within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861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Whalley, John and Shuming Zhang (2004) Inequality Change in China and (Hukou) Labour Mobility Restric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1068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World Bank (1997) *China 2020: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 Wu, Y. (1995) Productivity Growth,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 in China: A Three-Sector Analysi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21, 2: 207-229.
- Yao, Shujie, Zongyi Zhang and Lucia Hanmer (2004) Growing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15, Issue 2, pp. 145-163.
- 阿马蒂亚·森 (2002) 《以自由看待发展》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蔡昉 (2003) 《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 《中国社会科学》第 5 期。
- 蔡昉、都阳 (2000)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对西部开发战略的启示》, 《经济研究》第 10 期。
- 蔡昉、都阳 (2004) 《关于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构想》, 《党政干部论坛》第 9 期。
- 蔡昉、王德文 (1999) 《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劳动贡献》, 《经济研究》第 10 期。
- 蔡昉主编 (2003)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4: 转轨中的城市贫困问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 (2003)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003》, 中国统计出版社。
- 黄祖辉、王敏、宋瑜 (2005)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基于村庄微观角度的一个分析框架》, 未发表。
- 李实, John Knight (2002) 《中国城市中的三种贫困类型》, 《经济研究》第 10 期。
- 李实、岳希明 (2004) 《中国个人收入差距的最新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网站 <http://www.cass.net.cn/jingjisuo/yjy/person.asp?id=32> (2004 年 11 月 28 日下载)。
- 林毅夫 (2002) 《发展战略、自力更生和经济收敛》, 《经济学 (季刊)》, 第 1 卷, 第 2 期,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
- 林毅夫、蔡昉、李周 (1998) 《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地区差异分析》, 《经济研究》第 6 期。
- 林毅夫和李永军 (2003) 《出口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需求导向的分析》, 《经济学 (季刊)》第二卷第四期,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
- 宋洪远、黄华波、刘光明 (2005) 《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问题分析》, 载蔡昉、白南生主编《农村劳动力流动论文选编》, 商务印书馆。
- 王德文、张恺悌 (2005) 《中国老年人口的生活状况与贫困发生率估计》, 《中国人口科学》第 1 期。
-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部 (2004) 《关于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全面解决农村温饱问题的建议 (摘要)》, 《观察与建议》1 月 8 日。

